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0840

10位ISBN编号：710802084X

出版时间：2005-0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余英时

页数：5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书籍目录

-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
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1995年) -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自序
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1979年)
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1988年)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1999年) - 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嚴復與中國古典文化(1999年)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3年) -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1980年)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2004年)
陳寅格《論再生緣》書後(1958年)
陳寅格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2年)
陳寅格與儒學實踐(1996年)
試述陳寅格的史學三變(1997年)
猶記風吹水上鱗(1990年) - 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1990年) - 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1991年)
附：壽錢賓四師九十(1985年)
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1994年) - 《錢穆與中國文化》序

章节摘录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知识人与“道” 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但是“士”和“道”两个名词在孔在以前早已存在，其涵义也颇有不同。让我们先简单地谈一谈孔子以前的情况。商、周文献中常见“多士”、“庶士”、“卿士”等称号，这一类的“士”大概是当时“知书识礼”的贵族。商代卜辞中所见的“卜人”也许便是“士”的一种。《说文解字》和《白虎通》都说“士，事也”。因此今天不少学者都相信，商、周文献中的“士”，是指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事”的人。周代的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受过“六艺”训练的人称作“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而出任不同的“职事”。例如孔子曾为“委吏”，是管理仓库、核查出入数字的职事。这当然必须学过六艺中的“数”。孔子自己又说过：“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编辑推荐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作者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精彩短评

- 1、对胡适、陈寅恪做了深入的研究
 - 2、很有些读到的见解。
 - 3、打臉的書，尤其是讀了熊十力再讀的時候。
 - 4、现代危机，早已到来；思想人物，尚未可知。
 - 5、太多重复了
 - 6、看的我内牛。不同于其他的史学论著，此文讲近代人物，令我大发感慨。
 - 7、文章选的有些杂。和其它文集重复很多。
 - 8、让人能感受启蒙的典籍
 - 9、顶好玩的老头儿
 - 10、理解五四才能理解胡适
 - 11、胡适如果一本正经且有理有据就要绕昏头的
 - 12、看看余英时是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看看余英时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危机，又看看余英时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为应对文化危机的所作所为。“闻弦歌而直雅意”，看看余英时是如何治思想史的。
 - 13、对陈寅恪的研究，堪称经典
 - 14、那個時代的人啊，嘆服。
 - 15、余英时果然是大师
 - 16、何为儒，何为师？
 - 17、读这书的时候，就感觉是个老学者在你面前很缓慢地跟你絮絮叨叨地说着近代的那些人物，时不时翻开一本书，说：诺，证据在这里。不过，总觉得缺了一些什么，讲不出来的感觉。看了，豆瓣推荐的书评，也没有讲出个所以然。至少，没有看到特别赞的书评。评分高的书不是都应该有很棒的书评的吗！！？
 - 18、我们“不仅要对中国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息。”“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 19、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 20、我对史学已经没有兴趣了...
 - 21、知识分子的责任
 - 22、牛！其中一篇《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就可以进入历史1
 - 23、非常好读。现代危机，主要指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思想领域的错综复杂；思想人物，主要写胡适、陈寅恪、钱穆三人在其中扮演的地位，尤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从胡适日记看其一生、陈寅恪的晚年心境、钱穆为故国招魂几篇特别精彩。
 - 24、。
 - 25、许倬云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
 - 26、中华文脉在海外
 - 27、感觉像个学术混子，对于“士”和“庶人”的解读简直就是天马行空随意乱编。为胡适的辩护反而更暴露了胡的浅薄
 - 28、始识胡适
 - 29、胡适，陈寅恪，对这两位解读，还是蛮重要的吧
 - 30、现代危机，三大人物。
 - 31、开人眼目，足够了。
 - 32、讲了中国的文化危机，写了严复，胡适，陈寅恪，钱穆等人物，很欣赏他们治学为人的态度。看看是不错的。其实还是有点高深的呐。。
 - 33、读之心情大振
 - 34、再三玩味，胜境迭出
 - 35、很喜欢余英时论述思想、观念，阐释观点的口吻、方式，有体系、有脉络，至少不会一头雾水。
- ps：读后，只觉得原本很熟悉的“胡适”这两个字，突然间变得愈加缥缈，才知道原来心中所存有的胡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现在，当了解了更多，欲在心中建构起胡适其人时，却又觉得所读之书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太少，而不足以对某人某事某个时间段的历史有清晰的认识了。

多读书，多思考，愿迷雾渐少。

36、“若进而一察下文所引诗文，则《论再生缘》一书实以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之感怀身世，尤其次焉者耳！” P354

37、本科时读的第一本余英时的著作。推窗间月，不敢稍忘。补录之。一晃八年过矣。

38、读起来真顺。特别美～嬉笑怒骂尽有，尽显学人本色。有很多言论点评可以发挥，等着其他人去研究。

哈哈～突然发现好酷，不研究近代，却在近代自成一家之言。虽然没有专著，哈～毕竟不用专门研究啦

39、忘了

40、對此人感覺平平 疏闊執拗絕類乃師 塊面（子學，學術史）縱深又不及

41、为什么还有人标新儒学……

42、絕佳。唯言其師錢穆數篇稍弱。

43、想给每一个人推荐的书 不对 鉴于受众有限 是想把这本书讲给每一个人听……

44、右派分子的无耻言论。。。

45、作为一本论集，内容难免有重复。至于整体印象，不免想到友人说一代宗师里的章子怡，从头面瘫到尾，也不知算是有演技还是没演技。ps，胡适的部分写得甚有趣。

46、了解了胡适和五四运动

47、余老师一稿多用的赚钱方法可供穷逼文人们参考。

48、不能忘的人和事是我们的真生命。

49、时势咄咄构樊网，濠间旧乐不堪期。

滔天赤水倾洲陆，济海苍舟失涘涯。

男旦同操吠声技，书生肯学谗猗诗？

从来俊士多约束，遭际古今同一悲。

50、学术性专注

- 1、明朝史可法有句云“ 矾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这个“沉”字读来总觉得刺目刺心。余英时先生这部书中，追记“现代”危机中的几位极有代表性的先辈学人，读来亦觉得沉重。上半年时有门选修课的学期论文写陈寅恪先生，行文至中途，也是心绪回转，难以平静。“往事如烟”还是“往事并不如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 2、p2 “内在理路”（类似于logos主义的诉求，故引起反弹）p58 余英时对于民族主义的鼓吹。民族主义能够符合当今中国的需求吗？文化与国统的关系，尤其是共同体内部的分裂倾向，都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历来的帝国化倾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如何处理共同体与界线的问题最为关键。p65 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p68 颜元，章炳麟对毛的影响。p75 此篇文章（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很重要p90 理想国中的比喻p112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修海军科p387 陈寅恪晚年之凄凉郭沫若何以欺人太甚。余英时对胡适，陈寅恪等人物，确有深度研究。p425 陈寅恪：“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 p462 陈寅恪与欧洲第一流东方学家相较，也并不特别超出。p500 《国史大纲》并不易读p544 余英时对熊十力颇为不满p563 余英时在此对新儒家“教主”之批驳十分有力。
- 3、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文集，紧扣着现代危机四个字。所谓“现代危机”，在这里是指近代以来绵延至今的“中国文化的危机”。具体到个人，则可以说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时值巨变，在“传统”与“现代”两造之间多有波澜，这在“思想人物”身上最能得到反映。值得强调的是，本书论述文化危机的文字以及专论“思想人物”（严复、胡适、陈寅恪、钱穆）的文字，都是出自史家之笔，绝非泛泛之谈所可比拟。附带一说，余英时先生对新儒家（见《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来龙去脉的清晰梳理可引为经典。
- 4、只是一些文章的杂集不过看一看他和姜义华老师的争辩还是很有意思的开篇的文章很好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一直在走激进的道路
- 5、关于胡适，并没有特别的去了解过，只是读过一本贾祖麟的《胡适之评传》，此外虽然中国近代史也算读过不少，但遇到胡适的次数不多。这大概与他本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关，对于政治，他始终是游离于外，他试图以一种温和中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但他不能明白的是，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有中间立场的。1936年，正值华北危机最烈的时候，日方咄咄逼人，国民政府一退再退，而民间的反日浪潮自一二九之后日益高涨。胡适公开提出一个七点建议，试图重新鼓吹他一直在争取的和平，他告诉日本的读者，如果日本希望解决中日分歧的话，它就必须放弃《塘沽协定》、河北非武装区以及华北自治的计划。胡的这一建议招来了各方的火力。日本人控制的在华刊物提出把他逐出华北。中国学生组织指责其为卖国贼，因为他没有谈到“满洲国”的问题，似乎承认傀儡国是一个事实。胡适所不能理解的是，一项既让日本人满意、又能为中国民意接受的和平方案，在1936年是毫无希望的。在某种程度上，余英时与胡适一样，一方面他们有民族气节，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清晰的头脑，知道实力不逮时不宜枉自牺牲。他们似乎总在等待着某种奇迹，比如，中国突然奇迹般的励精图治，实力超越日本，然后从容的、没有牺牲的收复所有领土。可做一对照阅读的是，余英时在书中谈陈寅恪的段落中，曾引用并赞成陈寅恪论唐史的一段见解，即李怀光之军队当时所以反叛，并不在于李本人之好恶，必别有另一影响到全军之共同利害者。可是当余英时痛斥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对学生的煽动与胁迫时，他似乎忘却了，那时中国丢失东三省已有五年多，察哈尔若干县也落入敌手，华北自治的现实也一天天在逼近，国民政府则一退再退，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游行，到底是被共产党逼的，还是被日本人逼的呢？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下，1989年之后，余英时在普林斯顿接待逃亡至美国的众多“学生领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指责这些“学生领袖”不该煽动那些大学生们罢课上街呢？转回来再谈胡适，贾祖麟在《胡适之评传》中有一段精辟的评论，“在胡适对政治活动故作谦虚的后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及勇于思维而怯于行动的特质。他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有的偏见，即是将政治视为冒险而又肮脏的事业。有一种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想撷取政治的果实而不重视其根本，他们希望摘取每个果实-自由、议会、政府、政府的廉洁、经济繁荣以及免费的普及教育等等-要保持这些而与政治免除再进一步的接触。”我愿意把这样的人称为“政治洁癖者”，胡适曾经说，“民主政治”是最不复杂的政治形式，因此最适合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中国民族。他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

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同样，余英时对国共双方也都报以严厉的批评。诚然，确实这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都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余英时显然在做出评价时脱离了史家的立场。所谓史家的立场，即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须体会当事者之处境，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之大转型绝无和平道路可走，牺牲自不待言，罪恶也无可避免。我们必须跳出个人道德的窠臼，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对错误做出必要批评时，不能不看到历史的进步。尤其是考虑到余英时此书主要谈1949年之前以及解放初期的中国历史，那么近于全盘否定的苛刻就显然是不公正的。至于余英时引陈寅恪诗句借题发挥，批评中共建国后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这就纯属昧于个人政治立场的偏见了，他不仅看不到当时国际局势包括地缘关系绝由不得中国左右逢源，同时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为确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而做出了怎样惨痛的牺牲，例如牺牲农村农民以保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这正是为了能迅速在险恶的国际局势中站稳脚跟，避免成为苏联计划中的附庸地位，自然余英时包括胡适只会透过道德的棱镜看到这背后的牺牲，却看不到这牺牲所换来的，一百多年来所未有的国家独立。余英时曾谈到费正清操持的哈佛学派对胡适一直不以为然，以为胡适对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理解不及他们。这大概是对的，至于原因，大约可以用陈寅恪曾说过的一段话来解释，陈寅恪在解释自己出身晚清显赫世家却不治清史时说，正因为自己身世与清史有太多牵扯关联，所以才不治清史，以免个人的感情因素影响史家判断。我想，胡适和余英时，都是跳入了这个陷阱。必须承认，余英时在这本书中主要以胡适和陈寅恪为例，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这场剧烈变迁中的痛楚，谈的很透彻，也很深刻，在这一点上，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我以为，作者的局限正在于，他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太强，这使他无法真正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他把所有投向中共的知识分子都称为曲学阿世，除了坐井观天，还能给他怎样的评价呢。说到底，二十世纪的中国再也不是士大夫的中国了。(补记：事实上，这种优越感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起源之一。尽管这场运动最终以悲剧性的扩大化收场，但在起始，知识分子过于理想化和道德化而无视现实的思想倾向加之传统士大夫面对粗鄙武夫的优越感，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有极大影响。在今天，关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空洞的、用来反毛或反党的符号。至于这场运动背后的复杂成因，以及毛与党内其它高层势力的冲撞，却少有人提及。)

6、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知道了傅斯年和陈寅恪，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有了基本的一些了解，这也让我对史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更加对原有教育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反思的对比选择对象。历史，在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都是用来为统治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还是名义上的大众，而打扮。虽然说，不能通过时空隧道亲自去体验一把历史，但是多一些观点，多一些史料，我们可以对既定的历史观点产生自己的想法，进而丰富我们个人的知识，看到事物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然，历史就是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我们就是被鼓动的对象。幸而，看到了余英时的这本《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让我可以读到另一个胡适、陈寅恪诸家。虽然，本书的简介明显是与文中内容有些偏差，一些简介内容很难在文中找到，或许是简介者的个人独断，暂且不提。不过，还是可以认识到一些比较鲜活的全面的人物在当时的一些生活轨迹，比如胡适的社会活动，远比历史中那些干瘪的话语更有生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事件发生有其条件的铺垫，远不是某些抽象的理想一般。时光的脚步走到今天，社会正向一个多元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文中陈寅恪所提的某些历史观和方法，都在一一应验，社会在走向正常化。当然，我们也应该去反思这种正常化到底是该什么样子的。

7、古代有古代的危机，现代有现代的危机，这是一个无奈的时代，永远都是如此，于是我们总是从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寻找一些让我们寄寓于情怀的元素。。。

8、2003年以前我是个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记得当时对宿舍同学的历史偏好表示不太感兴趣。当时我只看一切虚构的作品，认为每一个“现在”的我甚至不能确认所谓的“过去”是否存在，现在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哲学上能成立，社会角度而言不成立的命题。抛开对玄思的偏好，回过头看我们所在的环境，对想象力不够丰富的我而言，向历史寻找解释甚至所面临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唯一的途径。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处于一种永远向前的状态，我们是怎么来到现在这个状态，是随波逐流的来的呢，还是自己能有所反应，而这个潮流又是怎样的，我们需要去了解那可能不存在的“过去”。那么在这儿历史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只是文献海洋中我能看到的那几篇参考文献而已，看不到的那就当也许不存在吧。这本书的现代危机是指清末，中国人几乎毫无自信的时期，中国及中国文化当何去何从，这是触及到一个中国人安生立命的危机。其列出的思想人物则主要是严复，胡适，陈寅恪，钱穆，同时还能看到他们相关的其他人物。这里面的每个人都同时有他们新的一面和旧的一面，我们只能去了解他们何以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他们的思想源流是怎么来的。但重

要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如果从他们身上学不到东西，历史里面没什么能为我所用的话，这样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史变迁，几次重大的学术创新，都是在传统的理论流为空言，再也不能触动社会的时候产生的。不过它们的正面意义所能作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就像Friedel震荡逐渐衰减，有时候甚至不能超过创立教义的人本身这一代。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回到古代，看看原始文献到底怎么说的，这大概就是到了清朝为什么牛人们都跑去考据的原因。回头看没有问题，但是要记得心中带的问题，能向回看，也要能转回来再向前走。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上的某些情境总能给我们一些借鉴；然而一切皆流，只靠历史是靠不住的。归根到底，最后都要返回自身，创造性或想象力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危机，如果我们放弃选择，没有人会代替我们做出最优应对方案。跟过去的知识分子比的话，我们大概只能算是文盲。但是现在信息获取垂手可得，我们有机会追求一点每天都有新发现，更重要或有意义的是，在知识的积累之外，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向问题，思考面临的问题，试图找出一点个人的建议。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能成为过去那种修齐治平的知识分子，并且，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9、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里花了大篇幅给胡适，可见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之重要。胡适在哥伦比亚拿的是哲学博士，不过他的哲学功夫不入金岳霖之眼，他的《中国哲学史》也不入冯友兰之眼。但这些都并不重要。胡适之于中国的地位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伏尔泰之于法国，开启的是思想启蒙之风。胡适倡科学、民主之风，此风刮之今日犹盛；胡适所倡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大陆未曾兴盛，却始终为意识形态之劲敌，促使其内部做出回应与革新。要说他带来的最大变化，乃是白话文对文言文之取代。这个变革，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从此艰涩的山林文学倒下，通俗的社会文学诞生。我总想说，任何的一次社会变革，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今天的遗老遗少还在怨念我们丧失了简约隽永的语言之美，攻击如梨花体的庸俗不堪，但毕竟大众可以阅读写作，可以参与公共讨论，知识和信息的内容不再拘泥于形式，知识的传播变得简单易懂，于一国一民族而言，这算是功大于过的好事。但如余先生书中所说，近代中国之启蒙远不同于西方之启蒙，因其特殊历史情境，它被过度政治化了。难怪李泽厚曾感慨，中国乃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此话怎讲？余认为，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对应于西方之文艺复兴，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对照物之“五四”，乃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的。“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尽管胡适对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有猛烈的批评，但他绝非全面抗拒中国传统。他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因大量的风化与腐蚀才会使得重要处更加清楚——由于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五四”却不同，胡适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标示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弊端，从而在现代中国学术自主性能够牢固建立以前，便破坏了它。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思的启蒙筹划，最终是以革命为导向的，因此它只认可文化与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弊，虽有千年传统为先，却表明我们在近代又一次丧失了学术和思想独立的契机。因此，中国的五四，中国的启蒙，与西方人本主义启蒙不同，结盟的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自由派从此被边缘化，成为少数精英振臂高呼却不入主流，也难入民间的阳春白雪。余由此结论一转，中国的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没有实现它们在西方实现的那些价值理想。而不管是思想史上的胡适，还是真实历史中的胡适，都显得有些无奈。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转型，将民主的理想从大陆带到台湾，然而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事情的发展演化，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旧人故事思想起，而今我们再谈大陆或台湾之民主时，胡适之的身影不知是否走远。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